

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正在成形：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摘译*

[英] 克里斯托弗·科克 (Christopher Coker)

张 依 译

一、中国道路 (the China Way)

当习近平审视美国和欧洲时，他看到了西方力量的显著衰退。如今，中国官员相信西方正在走向衰落；同时，他们也清楚中国正在持续崛起。美国的国民收入可能每三十年翻一番，但中国的国民收入现在是每十年翻一番。中国的既定目标是：到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 万美元。如果届时中国的既定目标得以实现，它的 GDP 产量将是美国目前所占全球 GDP 比重的 1.5 倍。

不过，如果你是美国总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的霸主宝座还不会被轻易取代：从历史角度看，美国仍然是卖空者的最爱。特朗普手握所有王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储备货币、令人羡慕的地缘政治位置，就算没有建隔离墙与墨西哥隔开，美国依旧坐拥世界最安全的周边环境。三十年后，美国将拥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年轻的人口资源，能源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同时，美国还拥有高科技领域内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并吸引了世界上最有天赋的移民。综上所述，对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人来说，手中仍握有一把好牌。

然而，中国崛起已成为当前的主要议题，它的成功秘诀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那就是文化。当代种种论辩的弊病之一在于，太多评论家的历史视野都过于短浅。还记得曾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吗？18 世纪末，日本的人均财富开始超越中国和印度；百年后的现代化进程又为日本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1941 年，日本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在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新板块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水准。18 世纪末，中国也占据世界经济总产出的 37%。

白鲁恂 (Lucian Pye) 曾经写道，文化显然在中日两国的情况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个时期发生变化的既不是人，也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两国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① 我们不需要对历史采取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们应该放弃任何声称历史必有特定“形状”的看法，而是通过认识文化的重要性来对历史赋予新的意义。拿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文明不仅是地球上迄今存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也是全世界在文化上最自给自足的文明。令人惊讶的并不是中国声明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是它竟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一主张。

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都能找到文明型国家的说法，在西方最负盛名的可能是张维为

* 本文第一部分摘译自克里斯托弗·科克所著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Christopher Coker, *The Rise of the Civilizational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一书的第五章“文明型国家”，第二至四部分摘译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的第七章“后自由主义世界”。——译者注

① Lucian Pye, “‘Asian Values’: From Dynamos to Dominoes?”, in Lawrence Harrison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的畅销书《中国震撼》(The China Wave)。^①该书出版后,作者游历西方,介绍他的观点:中国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与西方道路不同,在于中国不会强行输出自己的模式。中西道路还存在一个关键区别:作为一种政治文明,西方文明比较危险;相比之下,中国道路本质上是和平的、非扩张的、非帝国主义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不会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倘若确实如此,中国将真的与众不同;但事实上,它与今天的美国非常相似。在现实中,文明型国家也需要建立前沿阵地并开展公关活动:数百所孔子学院(据最新统计,笔者所在的英国就至少有20所)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大学;《中国日报》推出了海外版;新华社以及中国中央电视台安排了多语种节目;2015年,中国政府在纽约时代广场推出了一系列主打成龙、姚明和吴宇森笑脸的广告,在6个大屏幕上每天滚动播放300次。^②普通纽约人对此持何种看法尚不清楚,但这很可能是关于未来的某种暗示。中国人并非从骨子里不愿接触他人,相反,现在的中国似乎肩负一种(使世界)文明化的使命:向世界展示该如何行事(最好别对中国指指点点),并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将无可指摘)。中国向世界展示其未来主张的速度一直在加快。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告诉全世界,中国把列宁主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特有模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以代替西方模式的选择。^③

二、后西方世界

2017年7月,在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向他的西方领导人同伴发问: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有足够信心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吗?特朗普上任时带来了一套假设,也许他的前任首席战略师、现在已名誉扫地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最好地概括了这套假设。班农告诉《经济学人》,他加入特朗普浪潮的目的之一是,认为西方应该继续主宰历史高地。班农不仅仅是想送别宗教激进主义,他还怀有一个更大的使命:“我希望一百年后,世人回首往事,可以说出,重商主义的儒家体系失败了,而犹太-基督教-自由主义西方获胜了。”^④面向未来的愤怒驱使着班农,让他的言论总是传递出一种歇斯底里的偏执。他认为,西方正在失去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时候发起反击了。他的言论也反映了赢者通吃的零和国际政治观。

特朗普主义可能只是通向未来之路上的一个温和铺垫。西方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尽管西方曾经有足够的实力制定规则,但现在,他们执行规则的力量正在迅速减弱;俄国人已强大到足

① Weiwei Zhang, *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 Hackensack, NJ: World Century, 2012.

② Clarissa Tan, “China’s Civilising Mission: The World’s Oldest Civilisation Feels Ready to Teach the West a Thing or Two” (June 30, 2012), the Spectator,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china-s-civilising-mission>, retrieved June 5, 2022.

③ 正文中对十九大报告的表述为作者科克的理解。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原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详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④ “The Future of Bannanism” (August 25, 2017),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17/08/25/the-future-of-bannanism>, retrieved May 30, 2022.

以摧毁他们；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强大到足以重塑他们。

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折中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用来使特定政权的权力合法化，并帮助这些政权根据自己的利益打造政治图景。如果说它有一个首要主题，那就是：对西方作家的宏伟梦想——普遍主义——的彻底拒绝。

关于文明话题，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在生命最后时光提出：有一天，世界上所有文明可能会围绕一种“整体文化”聚在一起。^①尽管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这种“整体文化”会是何种形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也选择用同胞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的一个预言来结束他的《文明史》一书，即人类正处于打造统一文明的过程中：“（统一文明）在其吸引力上具有真正的普遍性。”^②现在看来，这些曾经令人欣慰的预言都业已过时。那些文明型国家，至少其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很可能会提出一些具有真正变革性的想法，来结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导地位。无论到底会发生什么，笔者认为已经可以预见，当前的世界体系将进行重要升级，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只是增添若干微小更新。

三、西方例外论的终结

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大多数仍然是西方国家，是人权运动的先锋，但这完全不代表自由主义文明是未来的唯一成功模式。已故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写道：西方很可能不得不接受，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对从现在到2050年间降生的30亿人口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它的价值观也许并非“普世”。^③罗蒂在自己的国家遭受颇多批评，尤其是来自右翼的攻讦，因为他告诉本国同胞，他们的人权叙事完全是一系列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偶然产物，并非“发现”了某种其他文明从未发觉、最终依靠西方对历史的理性推演得出的永恒真理。而且，正如罗蒂所坚持的那样，如果你真的相信一种理念，你必须坚信它最终会成功。此外，即使自由主义实验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推行，这也不是放弃自由主义的理由，就像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不能说服圣奥古斯丁放弃基督教一样。

历史学家仍然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必然性，但历史同样充斥着各种不连贯，例如，未选择的道路、戛然而止的寻知之旅。文明彰显出“涌现的特性”，即它们是由各异的经验和偶然事件形成的。如果你对欧洲历史的偶然性感兴趣，笔者推荐一本非常优秀的论文集，颇有一番道理，书名为《消解西方》^④。文集中的一位作者问道：如果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524—前459年）在萨拉米斯战役中失利，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是否就会胎死腹中？如果威廉三世对英国的入侵失败，那还会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吗？反事实的历史假设可能是西方人的发明，它鼓励西方人质疑他们曾坚持的一些预设，特别是关于自己历史轨迹的预设。

笔者最喜欢的“如果”出现在另一卷文集中：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① Pitirim Sorokin, *The Basic Trends of Our Times*, New Haven, CT: College &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Allen Lane, 1994, p. 8.

③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④ Philip E. Tetlock, Richard Ned Lebow, and Geoffrey Parker, eds., *Unmaking the West: '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设想，如果苏格拉底在德里昂战役中战死，将会发生什么？毕竟这是苏格拉底参加的第三次战斗，而且当时他年事已高。如果假设成真，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不会有哲学家柏拉图了（毕竟柏拉图正是因为后来的苏格拉底审判而唾弃政治，转向哲学）。如果没有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会在哪里呢？我们甚至可以发问，还有可能设想出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吗？^①

“我们只是取得了实验性的成功：想出一种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和睦相处，并且能增加幸福感的方法，看起来比迄今为止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有希望。”^② 尽管丹麦长期在人类幸福指数榜上名列前茅，仍有人对西方比其他国家更幸福的观点提出异议。况且，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此项实验看起来可能也不那么吸引人了。西方真的发现了最佳政府形式或是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吗？近来，许多西方人似乎也对自己的命运深感不满。

在罗蒂的许多美国同胞眼中，他是个麻烦人物，所以在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再引用一位无可挑剔的保守派作家——鲜为人知的英国人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生于1883年，在德国的炮弹轰炸中卒于1917年。休姆去世时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之前的悲观看法。他非但没有对“恐怖”感到震惊（大多数一战诗人看到血流成河时的反应），反而认为这完全符合他的认知，即历史不适合胆怯者。休姆认为，他是为了捍卫自由主义愿景而死的；然而，作为一个保守派，他无法完全相信这套理念。休姆写道：“某些时期，巨大却无用的牺牲是必要的，仅仅为了让世界已取得的任何尚不确定的‘好’得以延续。”^③ 休姆踏上战场时，没有怀抱任何幻想：总之，他并不同意官方的观点，即盟军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战；他上前线只是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目标——防止欧洲陷入德国统治。

未来，即使是美国人可能也不得不放弃他们自由干预主义的野心，但笔者不确定他们是否会放弃自由主义。无论特朗普有何打算，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西方最好继续说服自己：它坚持的价值观是真实的，或者至少对它自己而言是真实的，即使其他人已经对这些价值观越来越失去兴趣。笔者讲述这些故事的主要原因是其反映出的沉甸甸历史。我们并不知道西方价值观究竟有多“普世”，尽管未来的历史学家终会告诉我们。我们并未看到历史的终结，也并未站在能够傲然回首过去的特权位置。我们无法证明人类拥有权利，唯有继续告诉自己，他们确实拥有。况且，只要对自身历史有些许了解，西方就很清楚，如果他们选择相信人类没有权利，会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

四、重塑国际秩序

当欧洲人来到亚洲时，他们追求的是赤裸裸的与权力相关的目标，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只要求认可他们的文明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更是唯一一个真正胜出的文明。请记住，中国运作了近700年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并不是强制性的（尽管中国会惩罚那些试图逃避朝贡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朝贡体系让中国的支出远远超过所获收入，每增添一个附庸国，中国经济

① Victor Davis Hanson, "Socrates Dies at Delium, 424 BC", in Robert Cowley, ed., *More What If? Eminent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 London: Macmillan, 2002, pp. 1-23.

②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③ Alan Jenkins, "T.E. Hulme's Ways of Seein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Blog*, November 20, 2014.

都会进一步陷入赤字。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倾向于用给予来打动他人。^①

中国自称是一个独特的道德大国，因为它没有体系外的“他者”概念。它从未希望对任何人进行殖民统治；它从未有使他人文明化的使命。明代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火药帝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会通过使用邻国尚未掌握的新技术来威慑邻国。^② 19世纪中叶，中华文明圈被扼杀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欧洲人拥有更好的枪支，从而能够将一个迥然不同的规范性秩序强加于东亚。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在理论上是坚持平等主义的（即使一些国家被认为比其他国家更平等）；此外，它们具有强烈的法治特征，尤其体现在对契约关系的重视方面。对中国人而言，更不幸的是，西方大国对东亚秩序此前依托的等级制度并不感兴趣。为了取代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所说的“东亚外交中特有的家长式道德”，西方人选择通过“去个人化、规范、合理的国际法组织”来调解国际关系。^③

一些美国评论员开始怀疑，中国政权真正追求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首要地位。^④ 本体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味着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事情，包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下，中国的想法是让国家在未来重回世界中心，回到它自己认为、也被越南等国家视为文明本身的巅峰岁月。19世纪，法国人来到印度支那时，那里的官员如果想在选拔考试中获得成功，仍然需要具备儒家知识和用汉字书写的能力。就此而言，中国的优越更多体现在文化层面，而不是政治或经济层面；当外国使节在中国皇帝面前鞠躬时，他们承认的是皇帝的文化优越，而不是政治权威。^⑤ 或许21世纪的中国也会愿意满足于类似的文化优势。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似乎也想要某种“特殊的文明权利”，或者是在现有规则重写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或者就作为挑战既有规则的一种方式。

还有其他人对新的世界秩序表达构想吗？印度似乎正徘徊于三种相互竞争的愿景之间：作为一个领先的自由民主国家，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拥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是一个由未来大国组成的俱乐部，这些国家除了“崛起”这一共有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相同之处；或者回归一个完全印度化的概念——达摩之治，构建一个平静和睦的世界。无论印度最终选择怎样的道路，或许都会采取与中国不同的姿态；在忠于自己传统的前提下，印度可能不仅会表现出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宽容，还可能会表现出对文明对话的真正尊重。

“9·11”事件后，民主似乎在退潮，因此一些西方人，例如美国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了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想法。有趣的是，这一想法对美国民主党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对共和党人的吸引力。而事实上，它最先由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① Daniel J. Boorstin, *The Discover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② Howard French, *Everything under the Heavens: How the Past Helps Shape China's Push for Power*, New York: Alfred Knopf, 2017.

③ Andrew Phillips, *War,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Yongjin Zhang, “China and Liberal Hierarchies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wer and Negotiation for Normative Cha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92(4), pp.795-816.

⑤ David Kang, “Civiliz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hadow of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Madeleine Albright)等自由国际主义者提出,然后才被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高级顾问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和同样在奥巴马政府工作的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学者进一步发展。^①不难看出这个提议为什么有吸引力,或者至少在华盛顿的权力层看起来颇具吸引力。还有什么比邀请印度加入这个俱乐部更诱人呢?印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亚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

目前,大多数印度政治家仍然持怀疑态度:如果亚洲的世纪真的已经到来,印度为什么要参与西方应对世界变化采取的迟钝反击呢?相反,一些印度学者已经开始主张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不只是呼吁“多样性中的团结”,而是呼吁“相互合作”——达成不同文明之间真正的利益和谐,这种和谐更加友好、更能反映自然平衡。如果这一切想法现在听起来还不甚明了,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也正因如此,这些想法和主张不太可能吸引“华盛顿走廊”的现实主义者,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但你可以从迪恩达雅尔·乌帕迪亚(Deendayal Upadhyaya)的《整体人文主义》(*Integral Humanism*)一书中找到基本思路。该书很快成为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 BJS)的政治纲领。印度人民同盟是印度人民党(BJP)的前身。今天,书中论述的想法似乎已被基本废弃,在印度并没有太多主流政治家推动这一想法。目前,印度对中国崛起日益担忧,似乎更倾向于坚持目前的世界秩序。

一个由两大不同集团或两种不同秩序组成的新世界似乎正在成形——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跟更尊重它的一方协作。但是,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中警告的那样,地区竞争(尤其是文明竞争)极易导致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比国家间的争斗要危险得多。^②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资深政治学学者

译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助理

^① Robert Kagan, “The Case for a League of Democracies” (May 13, 2008),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f62a02ce-20eb-11dd-a0e6-000077b07658, retrieved May 25, 2022.

^②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Allen Lane, 2014.